

中华美国学会
中华美国学丛书

梁茂信 主编

美国社会发展与中美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华美国学丛书

美国社会发展与中美交流

梁茂信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社会发展与中美交流/梁茂信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7

(中华美国学丛书)

ISBN 7-5004-3848-6

I. 美… II. 梁… III. ①社会发展-研究-美国 ②中美关系-研究 IV. ①D771.2②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0864 号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367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梁茂信 陕西合阳人,1959年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著有《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探究美国》和《都市化时代》等。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和《美国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外来移民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历史影响”、“美国革命时期黑奴制合法地位的确立”、“当代美国人口流动及其区域性影响”、“当代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困境”、“略论美国政府在解决城市社会问题中的效用有限性”和“战后美国就业与培训政策体系的形成”等论文三十余篇。

本书的出版得到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特此致谢。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is made possible par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Publishing Subsidy funded by the Ford Foundation.

序 言

“美国社会发展与中美交流国际研讨会”于2002年6月22—24日在长春举行。此次会议由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协办。来自中国、美国、韩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学者及美国驻华使馆和驻沈阳总领事馆的部分官员参加了会议。其间，近百名学者通过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的形式，分别就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化、政治与政府、经济与社会管理机制、宗教与文化、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部分学者还就中美两国的企业管理、会计培训及大学教学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会后，我们从与会代表提交的近百篇论文中挑出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整理成集，仅供国内有志于美国问题研究的专家、师生和科普工作者参考。

举行此次会议的初衷源自两方面考虑。第一，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导致了两国外交关系上的敌视，并促使两国加入了冷战的行列。长期的遏制与反遏制加剧了两国间的隔离和偏见，其间的“热战”又使两国关系雪上加霜。在此过程中，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友谊以及作为自然意义上的人所具有的需要和平与交流的共性特征，受到了摧残，由此引起的民族心态的扭曲、对人性认识的破碎性、文化上

因隔阂而引起的疏远性等等无疑值得痛定思痛。尽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两国因彼此国内发展和外交上的需要而使双方关系逐渐解冻并走向正常化，但此后到 20 世纪末，两国关系跌宕起伏，风雨飘摇。双方所付出的代价无以估量。这一切说明，两国间的交往和了解仍远远无法满足两国人民之间和平交往、共同发展的需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近似于作为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彼此在国情、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需要相互沟通和了解。惟其如此，才能在相互认同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取长补短，进而有利于双方社会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学者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们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探索者，其本身就是其母体文化的载体，他们多年来通过对历史和现实资料的整理、理性思维和理论分析等，对本国人民在改造自然、提高人的自我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丰厚的文明和文化，在不同层面上形成更加深刻、系统而全面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体现在文字上就是“文明再创造”的过程。因此，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就是加强中美两国在更深层次上的认知。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上的新闻工作者、民间友好人士及其他有志于中美交流的仁人志士推进更加广泛的交流，奠定厚实的基础。

此外，举行会议还可以为中外学者提供面对面的交流机会。这种交流还有一种独特的功能：学者们只需很短的时间就能解决那种纯粹依靠闭门造车而无法解决的问题。由此产生的感性认识对通过资料研究所形成的理性认识的升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尽管当前国内学人与外界交流的机会日益增多，但对于那些身在边缘地区或因种种原因而缺乏对外交流机会的学者来说，这种交流愈加重要。同时，这种会议还具有一种穿针引线的作用，使与会的中外学者从此以后长期保持一种学术上的联系。因为，人与人之间一旦相识后，其交往在多数情况下不是一次性的，而

是长期的，甚至是终生的。这就是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第二，最近二十余年来，中国的美国问题研究日渐升温，硕果日见，无论是学术性专题研究还是科普类读物，都在整体上给人以振奋的感觉。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从类别上看，有关现状类成果比历史类多，科普类比学术类多，有关美国军事、外交和中美关系（含中美贸易）等方面的成果比纯粹研究美国国内的成果多；研究美国国内时，有关其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成果比探讨社会犯罪史、立法史、司法史、环境史、政府间关系史、经济史、少数民族史、种族关系史等方面的成果多；而关于美国少数民族特别是印第安人问题、西班牙裔以及对妇女史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关于这一点，相信读者阅读了《2000年中国的美国问题研究——对当年文章的定量分析》后就会得出相似的看法。此文中，作者通过对194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进行纵向比较后，重点对2000年的文章和译文进行了分类和研究，认为成果在总体上呈全方位、多层面的上升趋势。其中，美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是研究的热点，中美贸易和中美关系等方面的文章独领风骚，军事和教育类研究引人注目，而哲学、历史、地理、科技和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等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有些文章一稿多投、重复发表；有些在学术规范性上需要加强；在研究方向上，不少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需大力推进，其中包括美国的税法、科技立法、妇女和阶级结构变化等问题。在研究氛围上，争鸣性文章少；对国外新兴课题的跟踪研究不够重视，目录编纂和资料库建设几乎无人问津。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美国研究就难以跃上新的台阶。

对美国制造业系统进行深入的研究，国内几乎是空白。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关于“美国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论”的讨论》就是一种将学术研究与美国学界的研

究动态紧密结合的佳作。文中对英美学术界围绕美国制造业体系的讨论条分缕析后发现：（1）美国的枪械零件制造业思想并非起源于美国，而是由法国传入。内战前，虽然美国在该行业已经实现了标准化生产，但并未扩大到其他工业部门，民用工业生产流水线的普遍化则是在 20 世纪初。（2）针对一些美国学者提出的到 19 世纪中叶美国制造业已经超过了英国的观点，作者认为，到 19 世纪末以前，美国制造业的资本密度逊于英国。就劳动力资本密度而言，美国的技能生产部门高于英国，而非技能生产部门低于后者。（3）内战前，美国经济发展是通过市场的扩大、劳动力分工的增强、生产上的专业化及合理配置资源等方面的变化实现的，同时，美国政治和组织结构的调整，特别是鼓励技术发明的政策所引起的积累性效应，使内战后的工业革命成为可能。（4）关于 19 世纪美国制造业迅速发展的动因，作者指出，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着力缩短商品生产和营销时间，在资本投入上精打细算，改进生产管理，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加强生产中资本密度深化等等，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使美国的社会面貌和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美国的城市化。在此过程中，黑人作为美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其城市化也在 20 世纪有所加快，与之相关的黑人贫民区的形成和变迁一直是美国社会长期关注的问题。《美国城市黑人聚居区的形成、现状及治理》认为，城市黑人社区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即 1940 年以前的形成时期、1940—1970 年的发展时期和 1970 年以后的恶化时期。从总体上讲，黑人社区的形成主要是城市白人歧视的结果，同时，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在二战后城市更新时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黑人住房问题，反而使之更加恶化。最后，在郊区化的发展过程中，黑人中产阶级纷纷迁出中心城市后，黑人社区失去了领导核心和经济资源，结果使黑人社区雪上加霜。作者对芝加哥、纽约

和亚特兰大大都市区的黑人聚居区的人口构成和住房状况进行了简要的描述后，将更大的篇幅用于这三个大都市黑人社区的治理方面。其间，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和黑人社区组织等多方合作的模式，以及当地政府的综合治理和积极推进种族融合的政策，均为过去鲜有生机的黑人社区注入了活力。但从长远看，要彻底改变全国黑人社区的整体面貌，美国社会和政府仍然任重道远。

美国是一个民族多元化国家，各民族群体为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而围绕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展开了一次次激烈的竞争。无论其竞争方式如何，毋庸置疑的是亚洲裔与黑人都有着相似的、长期遭受激烈排斥和歧视的经历。尽管亚洲裔在美国历史上通过自己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安分守己、自强不息的精神求得了一席之地，但是，只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当黑人对白人长期奉行的种族歧视和隔离制度强烈不满而发动城市骚乱的时候，一些美国学者给亚洲裔套上了“模范少数族裔”的花环。关于其实质，《“模范少数族裔理论”：神话与现实》一文认为，提出这种理论的美国学者别有用心，他们的真正动机是通过褒奖亚洲裔来批评黑人的懒惰性和对政府救济的依赖性，说明美国社会的民主性和平等性。到 80 年代，这种理论再次兴起，目的就是通过表扬亚洲裔，批评美国教育质量的下滑，呼吁更多的美国人承担起对家庭和子女教育的责任。但是，这种理论一方面掩盖了亚洲裔中间存在的贫困、失业、就业中的同工不同酬以及高学历低职业等现象，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对种族关系具有一定的煽动性。它通过暗示的方式，加剧了美国社会上的种族歧视，使亚洲裔面临着更大的心理压力和排斥。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种理论既不准确，也不严肃，故应予以鄙弃。

当代美国，各类社会问题十分突出，其中最令美国人不安的就是暴力犯罪。在各群体中，青少年犯罪率增长之快，令人惊

讶。《美国青少年暴力犯罪的特点及原因分析（1960—1990）》一文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历史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对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青少年犯罪的整体趋势、类型、特点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青少年吸食毒品、强奸、抢劫和谋杀等犯罪增长较快，总体犯罪年龄在下降，团伙犯罪日益猖獗。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1）60 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危机与滞胀交错、共和党减少福利支出、城市生态组织结构的变化等因素对社会下层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导致了社会贫困率和犯罪率的起伏。（2）战后青少年生活环境的变化使其淡化了传统的价值观念，新左派运动、反战运动、反主流文化及妇女运动中的性解放思想和黄色影视的泛滥等，增强了青少年对家庭的束缚和传统伦理道德的反叛心理，而贫困家庭、单亲家庭和暴力家庭的增多又扭曲了青少年关于家庭、社会和家庭生活的观念和心态，媒体关于色情和暴力的宣传又刺激了青少年施暴的欲望，吸食毒品的嗜好又促使他们去偷盗、抢劫或谋财害命。（3）联邦政府关于青少年犯罪和枪支管理立法中，始终存在着纵向和横向的矛盾性，从而使政府政策相互抵牾，事倍功半。在这种条件下，青少年犯罪不断飙升，并成为美国政府难以解决的头痛问题。

如前所述，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社会。这种多元化赋予了美利坚民族文化斑驳陆离、五彩缤纷的特点。大众文化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走向既能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美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现当代美国文化熠熠生辉、千姿百态的性质与特点。在这方面，《美国大众文化研究的三个趋势》一文为我们认识美国大众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觉。作者指出，自 20 世纪末以来，美国学界一反传统观点，加大了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大众文化最具有“文化工业”的特征，因而其研究也超出了美国本土的范围。在作者看来，当代美国大众文化研究主要趋势是：（1）大众文化的艺术价

值、审美价值和大众文化的功能；(2) 大众文化是否是被动接受的文化工业的产品；(3) 技术对大众文化与社会政治关系的影响。上述三种研究中，始终存在着对立的观点，但其中的主流是对传统的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评理论的否定，认为大众文化具有一种文化形式的价值，强调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者的主动参与意识以及大众文化领域技术对文化与社会政治关系的影响。新大众文化研究注重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理论方法，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但是，新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并不能抹杀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生产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和目的。

美国政府政策与政治是学者们探讨的另一个主题。目前，虽然国内学者对美国联邦政府城市化的研究已初具规模，但对政府相关政策的研究尚嫌不足。为此，《美国联邦政府城市政策体系的形成》对美国建国以来联邦与地方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进行了评价，认为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在管理中的脱节导致了19世纪各城市腐败现象的严重泛滥。尽管联邦政府有意干预城市社会问题，但宪政体制中的种种制约因素成为其裹足不前、无所作为的桎梏，以致到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才慌忙应对。新政时期，联邦政府各种措施的出台标志着美国联邦城市政策的形成，联邦政府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发生质变。在此过程中，虽然因种种因素的制约而使联邦政策的效用受到限制，但它毕竟开启了联邦与地方政府携手干预城市社会问题的新时代，其中的经验教训也为战后各种城市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借鉴和参照。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美国是一个后起的国家，但是，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它由弱到强，并成为当今世界上的一个超级大国。关于其中的促成因素，国内已有不少成果，但是，关于美国军事力量及其组织结构的发展变化的探讨，尚待加强。令人庆幸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人力动员政策》从历史学的角度，对美国建国以来的战争人力动员思想和政府政策，特别是对

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事人力动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自殖民地时代以来，北美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各地政府不得不选择以最小的经济代价来最大限度地满足防务需求，结果使美国的军队从建国开始就形成了平时维持少量军队而战时尽力动员的体制。虽然在一战中这种体制暴露出了许多问题，但经过二三十年代的系列改革，通过发挥地方高校的作用，加强对基层军官的培养和平民的军训力度，为 40 年代美国参加二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战争中管理体制的完善，尤其是退伍军人保障制度体系的建立，既解除了军人及其家属的后顾之忧，也为二战后美军战时人力动员体系的完善创造了条件。

在冷战时期，美国为维护自身的利益，确立其在西方世界中的领导地位，不断地加大国防支出，其结果不仅对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美国国内社会、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都留下了时代的痕迹。但是，关于冷战时期美国国防支出对美国经济的影晌的研究仍缺乏系统性的深度。《美国联邦国防支出在南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950—1970）》运用比较全面的资料，对美国联邦国防支出在南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联邦政府作为最大的投资者、消费者和金融市场的宏观调控者，以冷战为契机，不断加大国防支出，引导南部发展以国防为主的高技术产业，使其成为当代美国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到 1970 年，南部经济虽然不能与在全国经济中长期处于龙头地位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分庭抗礼，但却为其在 80 年代以后与西部和北部一起，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奠定了基础。这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以其特有的政策和经济职能，不仅可以从宏观上调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且可以在欠发达地区经济崛起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克林顿总统及其领导的联邦政府是学者探讨的焦点之一。《美国两党治国政策的重新定位：克林顿的中间路线》对克林顿

总统执政时期的政党纷争和政策选择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虽然在竞选中克林顿提出的施政纲领具有自由主义色彩，但是，他执政后却实施了明显偏左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克林顿作为新的民主党人竞选，作为旧的民主党人管理，具有色彩浓厚的中间路线的特点。在 1994 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在参众两院获胜后，对民主党的冲击如同“政治大地震”。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政府围绕联邦预算等重大问题与共和党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其结果就是不得不吸收一些共和党人的主张和思想。1997 年两党在预算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不仅标志着克林顿中间路线步入正轨，而且说明新时期美国统治阶级的国策重新定位业已完成。在实践上，这种政策产生了两大奇迹：一是经济高速增长；二是减少了财政赤字，实现了财政赢余。这表明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党不能随心所欲，必须遵循客观的规律。

应该说，克林顿时期的政绩是比较突出的，但是，他又是一位多事的总统。与他相关的种种绯闻事件不时地在美国政坛上掀起阵阵风波。他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绯闻以及他在国会调查中的种种不良表现最终使他陷入被国会弹劾的泥潭。对此，《克林顿总统弹劾案中的权力与权利冲突》一文从政治文化学的角度对这次弹劾进行了分析，认为此次弹劾反映了美国政治体制中多方面的权力和权利冲突。弹劾是罢免总统的惟一手段，但宪法关于弹劾的条款含义不明，国会在弹劾中的法则和法理也模糊不清。无所顾忌的“独立检察官法”在搜集证据时又表现出巨大的政治破坏性。这些都使法律至上的观念与个人权利价值在实践中难以平衡。同时，由于白宫和国会党派明争暗斗的核心场所，党派倾轧难免渗入弹劾的司法过程，使弹劾问题更加扑朔迷离。这不仅暴露出了美国国家制度中的许多问题，而且也引发了人们对国家政治和社会观念等问题更加广泛的思考。

在中国的美国学日益升温的同时，美国的中国学也在星移斗

转中同步发展。但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其成果究竟对美国社会和中美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国人知之甚少。在这方面，《美国学术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四十年回顾》就是一个难得的窗口。该文以中美国内发展状况为背景，总结了美国学界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来的研究变化和基本走向，阐述了其研究焦点、重心、方法论、特征等方面的变化及其原因，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和问题。作者认为，美国学界的研究经历了研究对象由宏观、整体到具体化、专门化、琐细化和多学科的过程，研究的层面也由过去注重与中国的政治事件、社会制度、精英人物和社会与经济状况等到地方基层机构、社会改革、企业改革、交通、地方志和普通民众等许多方面。虽然在各学科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各有差异，方法论上各有特色，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有许多领域尚待研究，但是，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不仅其整体成果成就斐然，而且还经过新陈代谢，形成了一支令人欣慰的研究队伍。他们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的同时，在中美关系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有关中国的研究中，对“文革”的研究比较引人注目。《美国对“文革”初期的中国的认识及对华政策》一文认为，自“文革”爆发伊始，美国学界和政府就十分关注。但是，由于美国决策高层对华局势的片面认识和错误推测，加上其内部关于对华采取何种对策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因而美国政府没有放弃对华遏制战略。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在对华贸易管制政策上，美国政府也做了相应调整，例如在食品、民用品及艺术贸易与交流方面做出了友好的表示。这种积极接触的特征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更加明显。“苏联威胁”论的升温和美国政府务实态度的增强最终为尼克松政府解冻中美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美国时，既要驳斥所谓的“美国例外论”，又必须看到美国历史上确有其独到之处。这方面的绝好例

证就是美国的城市化。关于这个问题,《美国的大都市化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的抉择》首先对美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和特征进行了梳理。文中以 1920 年为界标,认为此前为美国城市化的起步和完成期,此后是大都市化时代,其间,不仅大都市区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区域分布更加平衡。这种趋势在战后进一步增强。文中指出,美国的城市化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由于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偶然的外来干扰性因素较少,市场经济产生的影响比较直接,城市具有某种原型特征,即在起步阶段,增长较缓;在加速阶段,增长空前;到成熟阶段又进入缓慢阶段,其全部过程呈“S”形。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将美国同欧洲发达国家和亚洲的韩国和日本进行了比较,认为日、韩两国属于亚洲比较发达的国家,在人口、地理和文化等方面都与中国具有某种相似性,因而其城市化发展对中国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针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提出的控制大城市、有限发展小城镇的策略,作者认为,发展小城镇属于权宜之计,无法替代大都市化;另一方面,控制大城市不仅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而且在发展小城镇的过程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因此,应该首先在京津地区、长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扶持大都市发展,通过其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

中美两国的国情迥然不同,两国又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并非完全没有可比性。《20 世纪前期美国加州和中国岭南城市化比较》就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作者从中美两国的实情出发,对美国加州和中国岭南地区的城市化背景、进程、发展阶段、特点及其原因等进行了比较,认为 20 世纪前半期岭南处于人口和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中的阶段,而美国加州则已进入大都市化阶段。这种差距是由于两国的国情,特别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社会和中国的历史传统所决定的。同时,二战对两个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为加州的城市化发展带来了机遇,却

给岭南地区造成了极大破坏。尽管如此，两地城市化发展中仍具有一定的共性：如城市化与工农商、交通、移民和外贸等方面的关系；两地城市集中在沿海，其集散功能、城乡差别及城市在本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都比较明显。当然，两地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市政府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其结果都对其后来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东西方对待历史的不同方法》从另一个层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作者根据自己在中国的教学经历，以中西文化为背景，对中美两国在历史教学和研究方面进行比较后认为，在中国的历史教学中，应该更大地发挥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通过双向交流，使课堂教学具有更大的效果。在研究中，中国学者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是去“再造历史”，而是追求一元化解释。这种现象与资料条件的限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受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目的论、形态观念和道德论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学者如果要增强研究中的全面性，必须使自己的观察视野和研究层面进一步拓宽。虽然这种观点与中国学界目前的实际情况存有差异，但个中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思考。另一篇文章《广告业：一种在中国成熟的美国商业》则以国际广告业发展为背景，考察了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广告业发展，并将其与美国的广告业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两国在广告类型、模式、手段和发展过程等方面都存有较大差异。在20世纪末，特别是中国成功地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以后，中国的广告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中国与外国的广告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中国的广告业也面临着走出国门、让世界认识中国的机会。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将使中国的广告业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对中美两国而言，无论各自在发展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两国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全球化的挑